

2008

# 平南文史資料

第八輯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平南县委员会编印

# 平南文史资料

第八辑

(内部发行)

政协平南县委员会

1993年10月

## 目 录

碧滩事件“哨兵”逃脱始末	叶家春	( 1 )
晚清民国时期广东商人与平南商业	徐运权	( 3 )
平南土地改革纪要 <small>李惠民</small> 稿	谢彬、梁子祯	节录整理 ( 11 )
《平南县图说》说明的几个问题	黄素坤	( 20 )
明《殿粤要纂》所载《平南县图》	县博物馆供稿	( 24 )
大鹏瑶乡考古	李延名	( 28 )
平南县晚清、民国时期留学生名单	徐运权	( 29 )
平南县政协简介	潘 原	( 31 )
光天化日的兽行	刘思毅	( 46 )
武林义渡记	( 清 ) 甘曦文 梁子祯	标点 ( 47 )
大乌圩建圩时间考	莫建华	( 49 )
太平天国平南诸王选介	黄素坤	
蒙得恩		( 54 )
蒙时雍		( 56 )
《袁氏家谱》简介	梁子祯	( 58 )
附：新发现的《袁氏家谱》影印件		
平南八景	平 泉	( 60 )
附：清《平南县志》民国《平南县鉴》关于古八景的记述		( 63 )

# 碧滩事件“哨兵”逃脱始末

叶家春

笔者最近采访了大鹏乡景华村的赖志祥老人，他是碧滩事件逃脱的两名所谓哨兵的目击者。当年，赖志祥还住在桂平县江口镇六宝的古扫村。一天，他放晚学回来，碰见了嫂子娘家的两位余姓亲戚慌张而至，百般盘问没有外人方敢入屋，当晚这二人就住在赖志祥的房里，他亲自聆听了他们死里逃生经过的叙述。

一九二七年七月上旬，苏其礼、余济卿派出接运枪支农军后，也从江口乘船上贵县指挥。谢寿祺、谢美然率领四十四人，在贵县罗泊湾芦苇舟中领到从北流用汽车运来的长短枪四十余支、子弹二万多发，高兴不已，不待苏其礼等领导人研究安全路线就擅自返，七月二十二日，他们回到了碧滩的大片塘古庙（即都温坑村外瓦窑岭白庙）炊食，庙祝乘间密告劣绅李汉堂，旋即，桂军营长况思渊率兵和民团千余人前来包围。当时，全部农军出庙外埋伏在庙后山坡上准备血战，并以后来逃脱的两名农军为最坚决的主战派。其中一名叫余仕浩（花名叫怜棚十七），一名叫余乃庆（又名余庆中，花名叫猫公四），他俩坚持誓死抵抗，认为枪好弹足定能打出一条血路突围出去，力求死里逃生，总算无法逃脱同归于尽也不能缴枪就擒。敌人渐渐逼近了，这两个敢死队已

扣紧机扳准备射击，一个叫覃国豪的农军（花名叫亚冲二）慌忙用手拉住余乃庆不准打，带队人谢寿祺等也主张和平解决问题，天真地认为枪是当时省政府农工厅长俞作柏给的，量桂平反动派不敢下毒手，担心寡难敌众，多数人主张把枪缴了，余仕浩和余乃庆最后被迫顺从。然而，他俩还不死心，决定伺机逃跑，在敌人还没逼近之前，各自都把短枪埋在山坡的泥土里，以便逃脱回来再取，只把长枪缴出。

众人被捕时，都还没有吃饭，余仕浩和余乃庆还若无其事地用高丽巾打饭包背着随队被押离大片塘古庙。

一路上，这两个敢死者都在寻找逃跑的机会，但总没有办法逃脱。后来，刚巧途中有条羊肠小道绕经一带耙齿岭，小路横跨象耙齿那样的好几条排在一起的岭埂，每过了一埂又入一个深坳，每个深坳都在路下有个极深的水冲窟。胆大包天的余仕浩和余乃庆都不约而同地先后在押解队中藏入路下的水冲窟去，天黑后都摸回古庙山坡上去取枪。双方遇上了，都没找到枪（给搜山时搜了），天亮前两人匆忙向江口六宝方向赶路。回到古扫村住了两晚才回大鹏。

“四·一二”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农民运动日益加紧，桂平县支持农运的巫县长此时已经逃跑，省政府农工厅长俞作柏对被捕农军也不敢保释了，四十二位农军被反动派分两批全部在桂平城枪杀了。两位农军虽以他们的智勇死里逃生，余仕浩始终逃不出敌人的魔掌，还是在清乡中被捕杀害；余乃庆幸得潜伏在江口兄弟余乃美和余乃三那里没有遭难，直到解放初才在江口病死。

# 晚清民国时期广东商人 与平南商业

徐运权

从调查的资料看，在晚清民国期间，广东商人在平南开设的商号很多，资本雄厚，购销量大，成为平南商业的主干力量。

## (一)

广东商人（下简称东商），早在清道光九年（1829）就已经在平南经商了，（注1）以后陆续涌来，到光绪年间，来的人数更多了，再到民国初年，除了先后在平南开设商号的以外，还有一大批行商，经常往返于平南、广州、港澳之间，长年货如轮转，商路亨通。

在晚清民国期间，县内六陈圩较大的商号有四十多间，其中顺记、林新、华强、妙和安、和盛、盟盛、联发、联盛、盛发、关仁甫、戴兴、公源等是经营桂类商品的；恒芝林、安生堂、仁生堂是经营中药材的；高定记、万丰、均和、广源泰是经营苏杭布匹的；还有沈国庆、有信等是经营日杂百货的。上述二十多家商号，除了个别是与本地商人合

营的外，其余都是东商开设的。

同时期县内商业最繁荣的大安圩（原名大乌圩），东商经营的苏杭洋杂商号有仁信、裕昌盛、业记、顺泰、谭福记、裕盛、高义记、甘盛记；经营中药材的有广德堂、福和堂；经营桂类的有公安、合泰生、成发、妙和安、生和泰；代办美孚行的有梁敦贤；经营猪鸡牲口的有高义记（又经营苏杭布匹）、苏荣栈、李新隆、唐养怀；经营烟叶的有贞记、生产铁锅铁镬的有郑金泉、利发等二十多家。

襄江沿岸的丹竹圩，东商开设的苏杭铺有广章、其生；大米杂货铺有广生盛、成德；豆麸店有荣丰、通记；中药材铺有天福堂；蚕丝厂有广兴纶；金银首饰铺有宝兴、宝珍；当铺有泰来；家私木器店有潭三记、同利；腊味店有连栈；染房有广泰祥十多家。

距县城北面二十公里的思旺圩，东商经营的杂货铺有昆泰（后改营饼食）、恒兴；海味铺有南昌；山货铺有仁兴、均兴隆（以后改染布）；中药铺有赞和堂、天德堂、怡和堂、德生堂；油坊有同聚、德兴；染布的有联新（后营苏杭布匹）、广泰、茂泰、盛聚、阜昌、广丰；金银首饰的有华珍、胡全珍；当铺有祥亨、宝安；灵芝香草铺有和利，缸瓦铺有会兴隆等二十多家。

县治所在地的平南街，东商经营的苏杭铺有华兴、谦泰、茂和、贞泰、金利、福兴、隆盛、荣安、裕兴隆；杂货店有信昌、宏兴；当铺有顺兴、晋和、祥兴、德信；酱料坊和酱铺有信和、隆昌；药材铺有仁寿堂、仁和堂、大和堂；粮食店有顺利、忠和；染布的有盛和、茂和；图书店有钟元记；缸瓦铺有盛兴等近三十家。

据不完全统计，上述五大圩镇东商开设的商号，已经超过一百家，如果加上武林、大新、安怀塑、官成圩等的东商商号数字，最少也达一百三十家，大大超过县内及各地商人经营的商号数字。尤其是思旺圩的超过三分之二，（注2）平南街的超过五分之三。（注3）

东商经营的商号不但多而且资本宏厚，规模较大，购销商品较多。县内各地的大宗农副产品的，多数为东商购销。六陈圩桂类（包括桂皮、桂油、桂枝、桂碎等）商品为大宗，据该圩老商民陈树信回忆估计，每逢旺季圩日上市的桂类商品，一般都有二十多万斤，绝大部分为东商所收购，其中华强商号所收购的约占四份之一。为了支付款项，每天有十多条担头，挑运白银入市以作开支。大安圩最大宗的商品要算猪鸡牲口及烟叶烟丝，思旺圩的是山货，丹竹圩的是生丝，多数都是东商所经营。高义记是大安圩最大的猪鸡庄，广兴纶是丹竹圩最大的蚕丝商号，仁兴、均兴隆是思旺圩最大的山货铺。平南街的苏杭洋杂货，多数是东商经售，各圩镇的典押当铺，也是东商经营的，他们资本宏厚，能左右市场的典当交易。

东商的购销长期稳定，生意兴隆。六陈圩华强号老板，从他父亲到他，已经两代人了；大安圩李华轩老板，祖籍是广东省河源县安居塘迴龙村，他父亲李宝贞于光緒初年到来经商，到抗日战争，已经七十多年了，思旺圩药材铺贊和堂老板也经营了八九十年，其他东商老板也是如此。在这么漫长的岁月里，他们的生意稳定，顾客常临，间中虽有进退，也是进展的多，倒退的少。

尤其是在商场的自由竞争中，东商常常占优势，有某些商品基本上是独家经营。思旺圩是灵香草的集散地，起初是

东商“和利号”收购外销，由于利润优厚，本地商人也进行经营，但海外顾客见到“和利”香草，就争着购买，对其他字号的香草，就不加问津，因之本地商人不够东商竞争，只有改行，剩下和利独家经营相当长的时间。

## (二)

东商的事业之所以兴旺发达，财源广进，长期执平南商业的牛耳，是有其内在的因素的。

首先是东商的信息灵通，购销及时，减少货物积压，有利于资金周转和利润的获得。东商的祖居在广东，许多居住广州市，接近港、澳和海外，有的在广州至平南沿江各大商埠开设有店铺，形成了商业网点，有的组成联行，有利于商品的运销和扩大经营。并且组织有“汇驳”（注4）专司汇兑款项，方便资金的支付，有利于及时进货。

其次是东商老板有一套营商的本领和毅力，颇有事业心。许多东商老板，祖祖辈辈都以商为业，他们从小就参加了商业活动，等到他们长大成人，已经成为经商的行家或工艺制作的能手了。如思旺圩的染布行业，东商的技艺比较好，所染出的布匹，色泽比较鲜艳，而且不易褪色，所以他们的营业长期在经营中占优势。

有的东商老板为了发展事业而努力学习。大安圩老商民李华轩，年轻时到海外经商，努力学习英语，由于会讲英语，懂得很多国际商情，知道桂皮是印度孟买好销，桂碎是德国、桂油是美国纽约、土茯苓是巴基斯坦好销，他一回到大安，即及时进货，取得好利润，如有信息变化，他就及时

采取对策，避免差误。

有的具备一门行业的特技。六陈圩华强商号女主妇何志明，现年七十八岁，她有观察桂油的特殊技能。凡是收购桂油，只要经她用肉眼看看，用鼻子嗅嗅，就能分辨出桂油的质量情况，若有冲杂，冲什么都能一一说明。所以她收购桂油几十年，都能保证质量。这一技术，在当时没有化验仪器设备的情况下，显得特别重要，华强号之所以成为六陈圩的第二大桂庄，这是其重要条件之一。

第三是东商有商业道德，讲人和重信用。他们能做到货真价实，足斤足尺，明码实价，童叟无欺。无论生客熟客，儿童老叟，凡到他们商号交易，价格实在，秤头、尺寸足够，诚实相待。他们很讲究商场道德，如果有人在商场交易上缺德，损害他们的信誉，他们就共同起来给予抵制。有一次恩旺圩会兴隆商号老板，由于经营赚了钱，资本宏厚了，因而骄傲起来，在商业活动中做了缺德的事情，不但他自己丢脸，就是东商同行人，也感觉被他抹了黑，于是恩旺商会就提出抵制倡议，很快就有恩旺圩、桂平大湟江口、平南街、丹竹、大安、六陈、藤县濛江、苍梧龙圩、梧州市（部份）九埠东商（也有本地商），一致行动起来抵制他，迫使他公开承认错误，保证今后执行商场的习惯规约，维持商场的道德和信用。

东商重视人和。恩旺圩是鹏化、国安及部份瑶区的山货集散地，当时交通困难，除木材和柴料能利用水力运送外，其余全靠人力肩挑上市。每逢圩日（三日一圩）的头一天，货主自己或请人挑运货物到来，由于路途遥远当晚需要住宿，而圩上经营山货的东商老板，就另设架床被帐，给货主

和挑运工人投宿，并备厨房、柴草方便烹食。有时货到而货主未到，老板还吩咐伙计帮助关照货物，以免损耗遗失。

许多东商老板还能赊销货物给贫困顾客。每逢春荒季节，许多贫困的农户无现钱购买花生油食用，常请老板赊销，思旺圩同聚号东商老板能够给他们赊销一部份，因而到花生收获季节，得赊销的农民，就主动挑花生卖给他，让他扣清赊欠之款，所以他的顾客，很多是货主，是熟客。长期来往交易。

东商胸怀开朗、信任伙计。一般的东商商号，都雇佣伙计，做秤手、行江或坐柜，在工作中老板信任他们，让他们尽心工作。所以有的被雇佣人员，能够在一个商号连续工作几十年，有的做到过世。即使有个别伙计一时失足，老板亦能宽大为怀，规劝他改过，继续开展业务。如六陈圩公源号的伙计，有一次参加赌博，输了一百元洋银，他自觉不好交代，不敢会见老板，而老板知道此事，主动去找他，劝他吸取教训，还补些钱给他照顾家庭，这样使他愧悔交集，决心改过，加倍努力，尽心经营，不多久又为老板赚回大笔钱。

由于东商在经营事业的道德上技艺上，有明显的优点，所以他们的营业能顺利地开展，赚得较高的利润。但是，现在有某些人不加分析，一古脑儿把赚钱看作奸商，他们说：

“无商不奸，无奸赚不了钱”。照调查的资料看，绝大多数的东商老板，所赚的钱是在季节性、地区性货物供求关系上的差价，有的是经他们加工制作后提高的价值，这是正常商业活动所取得的报酬，是合理的许可的。与那些超出这个范围去拉帮结派控制市场、抬高物价，或以假充真，冲沙掺杂，短尺少两，奸诈欺骗，官商勾结，捞取暴利，是有原则的区

别的。所以不能把赚钱与不赚钱作为“奸”与不“奸”的标准。应该说前者是合法的商业活动，后者是“奸商”。

还有的人本来没有经商的事业心，又没有经商的本领，只存侥幸捞钱的心理，于是不讲经商的道德，不择手段，去贩卖禁品、毒物，危害社会人群，这是犯罪的行为，是不属经商的范畴。

### (三)

自新桂系上台，东商在某些方面受了一定程度的打击，特别到了抗日胜利后，受打击更厉害了，致使根本的优势消失，所以经营迅速滑坡。归纳起来，主要原因有如下几方面：

一、受国民党钞票贬值的损害。国民党中央政府滥发钞票，广西省新桂系军阀政府也大量发行桂钞，造成钞票贬值，物价浮动，后来广西省政府规定，凡是在“赎当”、“还货”交易中，以一元六角六分的桂钞，抵值一元银毫（称为加六六），这样使投放大量银毫的商号，严重亏本而倒闭停业，如六陈圩的当铺悦和号、思旺圩的当铺宝安、祥亨号相继停业。

二、日军入境，商号疏散避难，遭受日伪汉奸的搜刮。1944年秋，日军为了打通衡阳至广州、衡阳至镇南关的交通线，便加紧进犯广西，同年8月攻陷平南，沿江及平原各圩镇的商人，纷纷向边远山区疏散，转移的商品损耗破坏很多，来不及转移的，均被日伪汉奸、流氓地痞搬走了，致使商号元气大伤。到抗日胜利后无法继续经营。如联盛、和

盛、顺记、杏芝林、万丰、均和、安生堂、宝珍、宝兴、广章等一大批商号，先后停业或回原籍去了。

三、受地痞恶霸敲竹杆。地方上的地痞恶霸，专门向东商老板打主意，伸手要钱，而老板明知是敲竹杆，为了避免麻烦和不测，也得忍气施给他们。思旺圩的广德堂、昆和等商号，都被敲杆多次。有的顶住不给，事后也得迁移或回原籍去经营了。

四、遭土匪擒劫而破产。日军陷境期间，各地土匪猖獗，勾结汉奸抢掠商号。思旺圩广德堂被抢劫，财物一空，还打死了一个亲属；赞和堂老板被拉去勒赎，弄得人财两空。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大大地损害了东商的营业，严重地削弱了他们的资本，使他们在商业活动中的根本优势迅速消失。加上抗日胜利后，全国各行各业复员，广东各大城市商业很快恢复发展，县内大批东商趁此时机回广东开业。从此，平南的商业也就大大逊色了。

注：（1）县博物馆收集起的一座大钟，上刻有广东木客商人，于道光九年冬奉赠此钟给驯化花王水金龙官大庙的。那商人叫梁升记。

（2）据思旺圩老商民罗培才的回忆统计。

（3）据平南街老街民退休老师徐恒等的回忆统计。

（4）据老商民的介绍，“汇收”，是商业同行老板组成的汇兑组织、专司汇款的。在当时交易使用白银和铜元，很笨重不便携带，有了“汇收”方便款项往返支付。

附说：（1）本文是根据六陈圩老商民周美焯（65岁）、何志明（70岁）、陈树信（74岁）、大安圩老商民李华轩

(78岁)、黄二叔(75岁)、丹竹黄官安(71岁)、黄大志(68岁)、何端初(75岁)、黄沛南(65岁)、思旺坪罗培才(78岁)、廖益泰(85岁)、黄玉新(62岁)、张华安(76岁)、平南街徐恒(81岁)、温二伯(83岁)等老人的回忆介绍整理的。

(2)各圩的东工商号，有的出现在前，有的出现在后，有的后来改了名，所以统计不大准确。

1991.3.22. 稿

## 平南县土地改革纪要

李惠民 稿 谢彬 梁子祯节录整理

**编者按：**这份资料是原中共平南县委书记、县土改委员会主任李惠民同志提供的，原文3万多字，由于本刊篇幅限制，经谢彬、梁子祯同志节录整理，摘要发表。

平南县幅员广阔，农民在这块土地上耕耘，理应是土地的主人，然而在封建社会里，历史却被颠倒了。1949年解放时，占全县人口4.84%的地主占有全县土地66%，每户平均占有土地768亩（包括山岭、草塑），每人平均112.6亩。他们出租田地，雇工耕种，放高利贷，残酷剥削贫苦农民。而占总人口58.4%的雇农贫农只占有土地1.9%，每户平均不足1亩，每人平均0.24亩。其中不少雇农、贫农上无片解，下无寸土，这种土地制度早已严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农民迫切要求把它革除。

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命令全国实施，中共平南县委积极贯彻执行。

土地改革是废除二千多年封建地主所有制的一场极其广泛复杂深刻的社会革命。因此，必须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土地改革的领导，有组织，有步骤，分期分批进行。

### 一、清匪反霸，退租退押。

为了扫清土改的政治障碍，自1950年12月16日至1951年春，中共平南县委领导群众开展“清匪反霸，退租退押”运动。在这次运动中，全县共俘土匪14189名（抓获7157名，自新7032人），其中排级以上匪首1129名，枪决匪首及骨干分子1511人（包括部分通匪、济匪的地主、富农），关押3300人，缴获步枪5685枝（520、461、462等部队在大鹏、同和缴获的未算在内），短枪3360枝，卡宾枪18枝，重机6挺，轻机枪20挺，冲锋枪14枝，手提猪笼枪38枝，六〇炮3门，机关炮2门，电台1部，手榴弹384枚，造枪机床24台，电话机36台，各种子弹131721发，黑色火药枪2万多枝，全县斗争土匪恶霸5067人，判处死刑28人，判处徒刑63人，管制1349人，自杀508人（缺少两个区小部分数字），在运动中，全县建立408个农民协会，发展会员91782人，组建民兵10162人，培养村级农民干部654名，在300个行政村（全县521村）清算地主932户、富农714户，共退稻谷808845市斤，旧人民币74554980元，折谷74555市斤，物资折谷1231303市斤，黄金6斤7两6钱3分6厘（16两市秤），白银25565元。这一运动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中最顽固阶层的政治、经济势力，为土地改革创造了基本条件。

## 二、土地改革试点

1951年4至7月先后在大中、陈垌、马练三个乡试行土地改革。

1951年12月，成立平南县人民政府土地改革委员会，中共平南县委副书记李惠民任主任，县委书记何城任副主任，李兴武、谢兆麟、丁纪东、史清盛、徐进敏、蒙一平等同志为委员。

1951年12月29日开始在第七区院山、甘莲、罗陈、关垌、新田等5个乡、9个行政村、58个自然村进一步试行土地改革。在庆垌村设立土改办公室，各乡设工作委员会，由中共区委书记或副书记任工委会书记。乡下分14个土改工作组，干部361人，其中地、县、区、乡干部154人，南方大学、梧州师范师生207人，容县专署公安处洪向东处长、专区妇联主任关尤励亲临指导。

土改工作队实行三同（即与贫雇农同吃、同住、同劳动），队员生活费一般说每月45斤米、菜资4.50元，但都乐意于好工作，艰苦奋斗，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全心全意为贫雇农服务。

土改工作分四个阶段进行

### （1）宣传政策，组织雇贫农队伍

土改工作组一进村，首先召开全乡或全村干部会和群众大会，然后分别召开贫雇农、青年、妇女会议，宣传土改的伟大意义、路线、方针、政策，土改工作干部与贫雇农同吃、同住、同劳动。通过“三同”，访贫问苦，了解苦大仇

深的贫雇农，扎正根子。在扎根、培根、评根的基础上，由根子串连苦大仇深的贫雇农，组织贫雇农队伍，树立贫雇农为核心的领导。

## (2) 反霸斗争

院山等5个乡共有地主85户，582人。剿匪反霸、退租退押运动时，杀了17人（其中7人是其他成份的匪首），退出租押稻谷30多万市斤，地主阶级在政治上受到一定打击，经济上受到削弱，内部开始分化。而农民有了自己的农会和武装，初步改变了那里的封建统治局面。但是，地主阶级仍然拼命反抗土地改革。在经济上，从疏散、变卖财物直到烧毁房屋，没有一个地主没有破坏行为。在政治上，造谣惑众、威胁利诱、收买拉拢，制造宗派矛盾，利用派进去、拉出来的诡计，操纵村政权和农会领导权。针对地主阶级进攻情况，一方面深入进行阶级教育，清除宗派思想；进行阶级力量对比教育，清除怕“变天”的糊涂观念。并发动农民“报上当”，5个乡381户共报出隐藏地主分散的稻谷14474斤，物资折谷18904斤，农具16件，家具48件，黄金2两，东银2450元，旧人民币86万元，长枪1枝，子弹114发。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也狠狠打击了地主阶级的政治阴谋。另一方面，开展反霸斗争，始终贯彻区别对待、宽严结合的对敌斗争政策，分清恶霸地主与一般地主，违法地主与守法地主，大地主与小地主，区别对待，有计划地从小斗到大斗，反霸阶段打倒两三个；划阶级阶段打倒十之六七，没收分配阶段打倒全部地主。在反霸阶段，共斗争不法地主13户、17人，人民法庭公开审判不法地